

我的外交翻译生涯

 My Career as
a Diplomatic
Interpreter

施燕华
著

外

交翻译是一项
令人神往的事
业。你能接触

各国的领导人，体验他们
的魅力和智慧；你能置身
于重大历史事件，见证其
全过程；你还能亲身感受
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有时
针锋相对，有时亲切幽
默……

我写这本书，是想把我的
成长过程、外交翻译经历
与有志于外交事业、外交
翻译的青年们分享。

—— 施燕华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的外交翻译生涯

施燕华 著

 My Career as
a Diplomatic
Interpreter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外交翻译生涯 / 施燕华著. -- 北京 :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153-1461-7

I. ①我… II. ①施… III. ①施燕华-自传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2439号

责任编辑: 彭明榜

图片提供: 施燕华

书籍设计: 孙初+林业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5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00mm×1000mm 1/16 19.25印张 177千字 插图16页

2013年4月北京第1版 2013年4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册

定价: 3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77

序

楊潔篪

施燕华同志撰写的《我的外交翻译生涯》一书付梓了，可喜可贺。

翻译工作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届中央领导都十分重视翻译工作。周恩来总理曾就如何培养外交翻译和做好翻译工作作过一系列指示。他强调，外交翻译不仅要外文好，而且要掌握政策、熟悉外交业务。周总理还亲自回答翻译人员在翻译我国的一些重要文件过程中的问题。江泽民主席也很重视翻译，经常与翻译讨论我们的一些重要提法如何译成外文，外国人才能明白。中央领导如此重视翻译，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政策方针只有准确地译成外文，外部世界才能理解。今天，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此之密切，相互依存度如此之深的情况下，外交翻译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我的外交翻译生涯》记述了施燕华同志在1965年至1985年的20年间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1965年到1985年，是中国外交大调整、大变化的时期。特别是1975年到1985年，施燕华同志曾经多次为小平同志担任英文翻

译。“四人帮”在中国横行的时候，曾对中国外交造成过巨大冲击。小平同志在外交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并在发展中美关系、稳定周边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活动。施燕华同志参与了这些重大外事活动中的翻译工作，见证了中国外交的大变化。

现在关于翻译的书出了不少，但《我的外交翻译生涯》一书独具特色，这与施燕华同志丰富的外交经历是分不开的。

她是公认的外交翻译中的佼佼者。她长期担任中国领导人的口译，有大量的一线翻译实践经验。1991年至1994年，她担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领导过外交部的翻译班子，在翻译理论上也颇有造诣。此后，她出任过中国驻卢森堡大使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驻法国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多有建树，具有丰富全面的双多边外交经验。这些经历使她对外交翻译有着与众不同的感悟和诠释。

领导人的翻译，是一个十分引人瞩目的角色，许多青年人都向往这项工作。但是，要做好这项工作是不容易的，有一个长期锻炼和积累的过程，需要付出辛勤的努力。施燕华同志谈了她自己的体会，强调首先要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要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和很高的政策水平，同时要刻苦、勤奋、细致、认真。这是她在长期工作中悟出的真谛。

我和施燕华同志认识已经三十多年了。1975年初，施燕华同志从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回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此时，她已经是拥有十年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了，而我当时刚进外交部，也在翻译室工作。我和施燕华同志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共事了七、八年，还经常一起出差，彼此合作得很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严谨的作风和熟练的业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得益甚多。

《我的外交翻译生涯》是一本好书，值得广大外语、外事工作者，特别是有志于外交翻译的青年人仔细品读。我相信，这本书将有助于大家更加全面地了解外交翻译工作，进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外交，并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经验 and 启示。

自序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偶然性，人生道路并不会完全按照个人的设计而展开。我走上外交翻译——外交官的道路，就纯属偶然。

1958年，我被推荐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从此与外语结下不解之缘；1965年，服从国家需要，我从一个研究语言的研究生变成一名外交干部，从事外交翻译，一干就是几十年。

我18岁开始学英语，已经没有学外语的年龄优势了，照一般人的说法，“舌头已经硬了”。但是外国语学院的老师们对我们这些学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连晚自习都陪我们练语音。他们还仔细批改我们的英语作文，写下批注。我记得有一次，周珏良教授在我作文的一个用字下划了一道红杠，旁批“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着实让我琢磨了好长时间，查了许多字典才恍然大悟。

我感谢所有教过我的外语学院的老师们，是他们的辛勤劳动帮我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

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后，耳濡目染老一辈翻译家认真、严谨的作风，他们“连一个逗号、句号都不放过”，精确、严谨——这是对外交翻译，也是对外事工作的基本要求。

在工作中，我认识到，翻译不是“传声筒”，是不同文化间

交流的桥梁。外交翻译不仅要精通语言，还要有政策的自觉、广泛的知识，尤其是国际关系方面的知识，要不断追踪形势的变化。于是我迫使自己去阅读那些我认为枯燥无味的《参考资料》、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情况等。一旦钻进去，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劲头也更大。

外交翻译是一项令人神往的事业。你能接触各国的领导人，体验他们的魅力和智慧；你能置身于重大历史事件，见证其全过程；你还能亲身感受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有时针锋相对，有时亲切幽默……

为中央领导做翻译，给了我见证历史事件的独特机会。老一辈领导人在处理棘手的外交问题时，始终把维护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既坚持原则又显示灵活，多次打破僵局。他们的魄力和宽大的胸怀深深印刻在我脑子里，潜移默化，使我懂得什么是外交谈判，看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践，从而加深了理解。当外交翻译的丰富经历对我后来驻外当参赞、大使很有助益。

长期以来，人们觉得外交很“神秘”，外交翻译很“神秘”。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已更深入地融入世界，人们也更关心我国的外交工作。为了使人们感到外交不再“神秘”，外交部的不少退休干部纷纷拿起笔杆，发表他们的回忆录。

我写这本书，是想把我的成长过程、外交翻译经历与有志于外交事业、外交翻译的青年们分享。本书既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书，无意对所涉及的外交事件进行全面分析；也不是讨论翻译技巧的专著，没有对翻译的大段评论，而是企图通过一些小故事、作者的体会，从一个侧面帮助青年读者了解外交和外交翻译。

2013年3月5日

目 录

CONTENTS

序 / 杨洁篪 / 001

自序 / 004

第一章 小户人家的女儿

一、爸爸差点被扔入大海 / 002

二、妈妈的口头禅 / 008

三、勿忘“国耻” / 014

四、凭本事吃饭 / 019

第二章 走进共和国“第一部”

一、阴差阳错学了外语 / 026

二、从头学起 / 032

三、受伤的鸭子 / 038

四、翻译不是“传声的机器” / 043

五、我的人生低谷 / 049

六、第一次给周总理做翻译 / 055

七、磨炼 / 061

第三章 急行军，目标联合国

- 一、欣闻喜鹊叫 / 070
- 二、“英法联军”准备出发 / 076
- 三、周总理的嘱咐 / 083
- 四、“外星人”空降纽约 / 090
- 五、入乡随俗 / 098
- 六、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 / 106
- 七、穿皮鞋的“赤脚医生” / 114
- 八、没有欢笑的春节 / 121

第四章 “花果山”外的世界

- 一、联合国里的新手 / 130
- 二、破格的欢迎 / 137
- 三、亮相 / 143
- 四、咬文嚼字 / 150
- 五、蜗牛蒙冤 / 156

- 六、邓小平在纽约 / 161
- 七、把“长城”搬进联合国 / 169
- 八、联合国里的“孙悟空” / 177

第五章 外交大舞台

- 一、在纽约做“地下工作” / 186
- 二、西部白宫 / 193
- 三、下台后的尼克松 / 200
- 四、邓小平一锤定音 / 207
- 五、“美国欠中国的债” / 218
- 六、访美花絮 / 225
- 七、里根访华故事多 / 233
- 八、邓小平交锋法拉奇 / 247
- 九、邓小平的人格魅力 / 263
- 十、万隆会议30周年 / 273

第一章

小
户
人
家
的
女
儿

一、爸爸差点被扔入大海

我开始工作不久，曾有人对我说：“我猜你爸爸不是干部，就是教授。”我笑着回答：“都不是，我是小户人家的女儿。我爸是处于城市底层的平民百姓。”

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我的父母来自东海边上的一个小地方浙江镇海。他们可能是最早到上海的移民之一。我则是移民的后代。我在施家九个孩子中排行第六，是个幸运的数字。尽管九个孩子之中没有一个受到过东海水的洗刷，家乡水土的浸润，但宁波的文化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勤奋好学，不怕困难，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功之路。上海开放的“海派文化”，给我们这些移民的后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培育了我们的求知欲。我的成长得益于宁波和上海两种文化的影响。

我小时候一直很好奇，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在那气候宜人、物

产丰富的故乡呆着，非要拖儿带女、离乡背井到人生地不熟的上海来呢？后来我慢慢从父亲的口中了解到了上一代人的生活。

历史上，濒临东海的宁波是我国重要的商埠，对外贸易发达。我的祖籍地镇海是一个天然良港，航运业发达，商品交易活跃。宁波人，特别是宁波的镇海人，从开放中开阔了视野，学会了经商。他们中间许多人成为企业家。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向英国等西方列强开放五个口岸，其中包括宁波和上海。上海地处长江口，连接长江三角洲各地，船运可深入中国腹地，颇受西方资本家的青睐。到20世纪初，上海已发展成商贾麋集、物流通畅、位居世界第五的大都市。宁波的一批企业家看到上海的发展前景，纷纷坐船北上“淘金”。他们在上海成功的故事激励了他们的同乡，一大批贫穷的宁波人，抱着改变命运的企盼，也漂洋过海前往上海。于是出现了宁波人去上海的移民潮。

在这个移民潮中有我的父亲，他属于寻求谋生途径，改变贫困面貌的那群人。

我父亲是家中最小的，他大哥比他大17岁，带着他二哥在上海打工。我爸不到两岁爷爷就去世了，我奶奶、爸爸和我的姑姑，一家三口人的生活依靠我两个伯伯在上海打工赚来的微薄工资，和奶奶弹棉花、纺纱、织布赚的一点钱维持着，经常有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家里米不够，就把浆纱剩下的米渣当饭吃。

幼年时代的父亲得了痢疾，由于卫生条件差，营养不良，长期不愈，弄得人面黄肌瘦。他姑妈说这孩子没用了，去上海，在船

上把他扔海里算了。奶奶怎么忍心把亲骨肉扔到海里！她在镇海苦守，在地里摘些草药治我父亲的痢疾，算我父亲命大，过了一段时间痢疾好了。

1908年，我爸爸6岁时，奶奶决定举家到上海闯一闯，同行的有我的大伯母和10岁的姑姑。当时有四艘船来往于宁波和上海之间，其中英国人的轮船“北京”号最便宜，一张船票才2角钱。英国人看不起中国人，把中国人比作猪，卖票时说：2角钱一只。这件事在父亲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一条深深的伤痕，他经常跟我们说起：“那时候外国人不把中国人当人啊！”

到上海后，爸爸跟着我奶奶去工厂。奶奶做临时工，拉丝头，剥茧子，他在旁边看。有时工厂不允许小孩入内，他只好一个人在大门外等，往往要等到天黑了，又困又饿时，才看到奶奶迈着疲惫的脚步走出来。

爸爸只上了一年不到的私塾，学《大学》《中庸》《诗经》等，他记忆力极强，全能倒背如流，但不解其意。12岁时在一所工厂开的学堂里学了几个月，按他的年纪应是四年级，因他没上过学，只能上二年级。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爸爸才十几岁就去当了学徒，跟师傅学补麻袋。当时，粮食等散装货物全是用麻袋装，使用过的旧麻袋由经营废品的小贩收去，洗补完毕再卖出去。我爸爸学的就是这“手艺”，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可学，用的是力气。听他说，学徒头三年给师傅烧洗脚水，干杂活。“出师”后，学做饭（怪不得爸爸能烧一手好菜！）。当他十六七岁能干力气活了，就要做清洗、缝补旧麻袋的活

儿了。

麻袋店里成天尘土飞扬。麻袋很重，清洗、修补、摆放整齐，都是重体力劳动。我爸还没成年就开始干这样的活。难怪我看到他腿上青筋勃起，弯弯曲曲，医学上叫做静脉曲张，是重体力劳动的结果。

替人打了几年工之后，爸爸也想自己开麻袋店。他把省吃俭用省下的钱，加上向朋友借的高利贷，租了两间房，前面一间做店面，后间是卧室，收一两个徒弟，妈妈做饭，徒弟帮父亲干活。搬运旧麻袋时，尘土飞扬，前后房间都是尘土味，一家人生活在呛人的灰尘中。

那是抗日战争前，时局稳定，父亲的小生意稳步发展。1936年，他租了南市一座新建的二上二下石库门房子。窗、门、地板全是红色油漆，我大姐说，有点像《红楼梦》里的怡红院。其实与怡红院相比差远了，只不过同以前的条件相比，有天壤之别，她感觉住得“阔气”多了。一楼厅堂是麻袋作坊，有两个工人在那儿缝补、整理。厢房做饭厅。二楼两间卧室。搬进去后，我大姐、大哥他们高兴得楼上楼下疯跑。那时物价较为稳定，一元钱可买三天的菜，供九人食用。每顿四个菜，类似小康人家。那是我家鼎盛的时期。

1937年8月13日，发生了“八一三事变”，日军侵入上海，国军奋起抵抗，爆发了历时3个月悲壮惨烈的松沪战役。有一天，突然来了一辆卡车，把店里的麻袋全征用去做沙袋，开了一张收据，说抗战胜利后归还。姐姐看到爸爸拿收据的时候手在发抖。

店堂空了，全家赖以生存的财产，顿时化为乌有，“天堂”般的生活戛然而止。

日本轰炸机天天在“中国地界”盘旋、轰炸。我家那座“怡红院”随时有遭炸弹袭击的危险。

35岁的爸爸，一个人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但他好像早有准备，有条不紊地面对苦难。很多老百姓住进了难民所，爸爸却早已和朋友商量好，在朋友家暂时避难。炮声隆隆中，爸爸借了一辆板车，让外婆、妈妈抱着我三哥和还在襁褓中的四哥坐在车上，年龄稍大的孩子在后跟着，逃难到法租界一位朋友家中暂栖。

8月正值上海的盛夏，全家连婴儿共8口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热得妈妈脸上生出好多疖子。后来又搬了两次，终于在法租界边缘的安纳金路（现东台路）安顿下来。如此频繁地搬家，却没有耽误孩子们的学习，因为爸爸是选择暑假时搬家。搬了新家不久孩子们就进了新的学堂。

从此家道中落，我出生时，家中9口人（加上我外婆）全靠爸爸的积蓄和外出打临工的收入养活。爸爸也同人合伙开过水果店，做过小生意，帮人贩运麻袋等，都不太成功。原因是没有本钱，后顾之忧多，毕竟一大家子全靠他养活，不敢冒险。

爸爸做生意常受到地痞流氓的敲诈。他不愿意、也没能力巴结那些人，因此没有靠山。有一年大年初一，爸爸烧了很多菜，准备招待来拜年的侄子、侄女。不料一清早，一群人敲锣打鼓，舞着狮子走进了弄堂。爸爸知道事情不妙，把我们小孩们赶到另